

# “霸权稳定论”与当代国际经济法\*

## ——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诠释

刘志云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影响为分析目标的新型学科,其各种理论范式对于主要调整公法关系的国际经济法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功能,“霸权稳定论”即为典型。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框架,“霸权稳定论”对于当代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构建与运作、遵守与维护、及合法性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诠释路径。当然,“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法诠释张力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关键词】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霸权稳定论 国际经济法

从20世纪初起,源于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密切联系逐渐被人们忽视,经济关系被人为孤立于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外。不过,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紧张对峙状态稍为缓解,现实世界的变革又一次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一些结构现实主义者尝试改变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研究的脱钩状况,不仅开始重视经济因素,而且开始寻求两者研究的结合,强调只有政治与经济关系相结合,才能正确研究国际关系。<sup>[1]</sup>这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立足于国际体系结构以及权力分析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sup>[2]</sup>即“霸权稳定论”应运而生。从理论研究的逻辑上看,霸权稳定论在国际机制方面的分析成果,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与维护、变迁与解体,以及“合法性”等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 一、“霸权稳定论”视野下的国际经济法

结构现实主义对待国际机制理论的态度是复杂的,大多数结构现实主义者忽视甚至否定国际机制的研究,但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基本思路的霸权稳定论者,却对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机制之问题提起了足够的关注。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秩序稳定依赖于一个强大且具霸权实力的行为主体所创造的霸权体系,或者说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相反,如果国际体系中霸

作者简介:刘志云,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5CFX029。

[1]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 有关结构现实主义以及下文所提及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观点,可参见 Ole Holsti,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otkop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1, pp. 119-133.

权不再存在,那国际关系将会混乱无序和不稳定。同时,不仅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霸权的存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需要霸权的支撑。霸权国的实力越强,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秩序越稳定;随着霸权实力的衰退,全球秩序趋于动荡不安,已有的国际机制也开始失去其应有的效用。<sup>[3]</sup> 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与权力分析,霸权稳定论者对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对包括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在内的国际规则的作用给出了适切的定位。

一方面,霸权稳定论者不仅谨慎地同意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注意到国际机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把在霸权国的领导下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研究作为重点之一。在这种研究中,他们不仅用某种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创立与遵守来论证霸权与国际体系的稳定问题,也用该法律机制的变化来论证霸权周期与霸权国家的兴衰、霸权战争与国际体系变革的问题。英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议所促进和鼓励的自由贸易,及其所建立的 19 世纪末期的世界自由经济体系,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所建立的、以关贸总协定 (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世界银行 (WB) 等国际经济组织为支撑的国际自由市场秩序体系的运作,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受到的挑战等等,经常是霸权稳定论者用来论证霸权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或者霸权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常用案例。当然, GATT 以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自由贸易法律体系、IMF 以及其所代表的国际金融法律体系等等,在作为霸权稳定论者的研究对象以及佐证材料时,被习惯地称为“国际机制”、“国际经济制度”或是“国际经济规则”,而不是像国际法学者那样称为“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但这并不影响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可通约性,因为“依照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逻辑,它们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法律’规则的”<sup>[4]</sup>。

另一方面,与其他结构现实主义者漠视或忽视对国际法作用的讨论相比较,霸权稳定论者对国际法的作用给出了适切的界定。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国际法律制度对于维护霸权国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也是霸权国实现其统治的重要方式或主要工具。例如,吉尔平指出,除了权力和威望之外,霸权国实现对国际体系的统治的第三个手段是国际规则,包括调整外交行为和国家间的政治往来的规则、某些战争法规,以及调整国家间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的体系规则。当前霸权国已经发展到从简单地约定势力范围、大使的互派、社交的行为到详尽地编撰国际法的阶段。<sup>[5]</sup> 无疑,尽管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所坚持的国际制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相比,霸权稳定论者仍然是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模型,即认为霸权的力量是国际体系运作的主宰,国际制度必须在霸权国领导下,或者说依托霸权国的“权力”才能实现有效治理,但其毕竟已把国际法的规则作为实现霸权统治或治理的形式之一。与忽视对国际机制的作用之探讨的其他结构现实主义者相比,霸权稳定论者在包括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国际机制的作用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霸权稳定论对包括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在内的国际机制的研究是积极的,也指出了这些机制对霸权体系的稳定与维护的意义所在。站在法学的角度看,由于主权国

[3]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99-103 页;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87-108 页; 倪世雄主编:《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92-305 页。

[4] Anthony Clark Arend, *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5-123.

[5]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6 页。

家的存在,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一般可分为两种性质的国际经济关系,即横向与纵向国际经济关系,<sup>[6]</sup>而国际经济法实质上是一种调整纵向国际经济关系的、公法性质的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与私法性质的国际商法不同的是,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交叉产物,是国际政治在国际经济中的一种体现。因此,霸权稳定论实现了割裂许久的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新联结,这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是极其有意义的,其有关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机制的兴衰的见解对于理解当代国际经济法能够提供许多帮助。

## 二、“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理论诠释

对于分析历史上以及当代主要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与维护、变迁与解体以及合法性等问题,霸权稳定论能够提供有意义的思路。

### (一)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合法性”根源的分析

霸权稳定论对于霸权的“合法性”的获取的分析,对于霸权国或大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合法性”根源之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

从霸权国的立场看,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首先必须是对霸权国有利的,即它是确立与维护霸权国的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愿意接受这个霸权体系,直到霸权国衰落前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愿意遵守这种由霸权国主导的国际法律机制呢?无疑,这既是一个有关霸权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法律机制的合法性问题。对于霸权国的霸权体系以及维护该体系的国际法律机制的合法性的取得,吉尔平作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回答。他指出,对一个强国来说,其霸权的合法性取决于以下因素:这个强国在最近的霸权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确立现状的条约,以及为现存秩序而制定的章法便具有权威性,因为它们仅仅是上述现实的反映而已;该国提供了诸如某种有利可图的经济秩序或某种国际安全之类的“公共物品”;该国所居的支配地位可望在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国家的支持。<sup>[7]</sup>在这里,吉尔平点出了霸权地位的“合法性”获取的关键之处,即他以及其他霸权稳定论者并不认为霸权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的维护是大公无私的或是基本道德的。相反,他们认为,在霸权国依赖自身的“威望”建立与维持的霸权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机制的客观效果方面,既有实现霸权国自己利益的目的,也有符合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之成分。换句话说,“相互利益”既是霸权国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

虽然“相互利益”构成霸权体系以及维持该体系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合法性基础的解释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不可否认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此,基欧汉也承认,不仅仅是霸权的力量以及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机制有利于合作的进展,即使霸权本身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并减少了不确定性,因为在霸权体系下每一个盟国都能与霸权国开展正常的交往,并希望霸权国确保该体系的整体连续性。同时,维护霸权统治的国际机制是按照霸权国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为标准来建构的,在它们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霸权国与其伙伴必须寻找到共同利益,并协调彼

[6] John H. Jackson, William J. Davey, Alan O. Sykes, Jr.,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3rd ed.,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95, pp.2-3.

[7] 同[6],第34页。

此的行为,从而确保机制的合法性。<sup>[8]</sup>实际上,在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下,霸权国也是受制约的,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承担维护这种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责任,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因为对他国有益而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如果霸权国认为其他国家弄虚作假,或者认为,霸权国家为维持领导地位所付出的代价超过预期的利益,那么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就会下降;同样,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国之所以愿意接受霸权国家的统治,既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是出于对霸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威望和地位的尊重。如果成员国认为霸权国家的行动是在牟取私利,并且与它们总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背道而驰,那么,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也会削弱。因此,无论是那种情况,只要“相互利益”所奠定的利益平衡机制遭到破坏,霸权国主导的相关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合法性”之基础也必将遭受冲击。

从实践看,霸权稳定论有关霸权地位的“合法性”获取的分析,对于分析 19 世纪后半期英国依凭它的强大的国力建立与维持的金本位制度,以及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法律体系,乃至联合国与联合国法律体制的建立与维持的“合法性”问题,都能够提供一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解释思路或分析框架。例如,在美国支持与主导的、以 GATT 谈判为平台的贸易自由化中,美国无疑是获益匪浅的,因为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不过,为了盟国的团结,美国也不得不忍受了欧洲和日本对它的出口商品的歧视。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的 20 年中,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美国把它的许多狭隘的经济利益服从于盟友的经济利益,以致于创立了其他国家可以充分获益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体系。<sup>[9]</sup>

## (二) 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与遵守的分析

对于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的解释,来源于霸权稳定论者对霸权国为什么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霸权有利于合作达成这两个命题的回答。

霸权国为什么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 根源在于霸权统治与帝国统治方式不一样,霸权统治不仅仅依赖物质力量资源,也需要依赖制度力量资源。对于霸权国来说,它需要建立一个自由、稳定以及有效率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为这样一个自由秩序不仅有利于维护它的霸权,也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益。当然,这样一个自由秩序不仅对霸权国有利,其他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样,该秩序就变成了一种公共产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消费特点,若非有利可图,是没有人愿意承担公共物品的组建成本的。因此,凡是涉及到集体行动的地方,都不得不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国际经济领域,“与自由国际经济有关的公共物品包括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和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在国际经济中会比国内经济中出现更强烈的搭便车和国际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倾向。……公共物品曾经靠、也只能靠一个乐于为大家供应这种物品或能够迫使别国分担这种物品费用的领导国来提供”<sup>[10]</sup>。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的权力有利于克服构建公共产品时的“集体行动”困境,因为霸权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分担成本与惩罚背叛的行为,毕竟它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这时,我们已经涉及到霸权稳定论的另一个基本命题,即权力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构建。

[8]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信强、何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68 页。

[9]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7 页。

[10]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7 页。



对此,吉尔平提出与论证了霸权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将利用它的权力资源通过惩罚与奖励并用的方式将它所支持的国际制度适用于其他国家,从而建立起一种权力与规则并用的霸权秩序的观点。<sup>[11]</sup>实际上,权力有助于包括国际经济法在内的各种国际制度的构建,确实符合国际社会的一定现实,这一点甚至得到了结构现实主义以外的国际机制学者的普遍承认。如奥兰·杨在对国际机制形成的三种途径的论述中,就把依靠外力强制实施的国际机制作为一种模式。具体地讲,他认为,一个占据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制裁与鼓励的综合运用,而强迫别的国家遵守一致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通过这两种方式,优势国家可以得到它所期望的其他国家对机制的服从。<sup>[12]</sup>基欧汉也认为在制度的选择中将受到大国的偏好的更多限制;而本杰明·科恩也注意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具体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反映的更多是美国而不是英国的偏好。<sup>[13]</sup>从实践看,二战结束时美国凭借超强的、包括物质实力以及道德感召力在内的权力使得战后以美国为领导的霸权体系得以构建。就如霸权稳定论者指出的,美国的霸权首先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得以建立,无论是由美国发起建立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其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或者是带头参加 GATT 主持的贸易自由化谈判等等,都是确立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的重要步骤,包括 IMF、WB、GATT 所支持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成为美国维护其霸权,用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sup>[14]</sup>

同时,在霸权体系中,除依靠霸权国的威慑力来维持秩序外,还必须依靠国际规则来管理世界事务。霸权国以及盟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维持和执行者。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国的地位只有在国际规则既制约别人又制约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那为什么霸权国需要带头遵守国际规则呢?简单地讲,霸权国构建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机制的目的是解决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这可以帮助霸权国实现长治久安。一方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霸权国只有带头遵守这种规则,才能使得其他国家愿意遵守这种规则,从而达到解决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从而实现霸权国继续控制未来的目的。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尽管霸权国拥有无以伦比的实力,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愿望。相反,它不仅要求他国遵守有关国际规则,自己也必须加强进行理性的自我约束。霸主地位或领导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对其的普遍认同的基础上的。为了维护这种合法性,霸权国必须同样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因此,实现霸权管理或统治的三种途径是互相补充的。在霸权体系中,其他国家承认霸权国的合法性,愿意接受其领导,不但是出于霸权国具有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实力,更因为霸权国享有一定的威望,这种威望是靠霸权国公平地处理国际社会中的事务而赢得的,而带头遵守国际规则是重要的一环。<sup>[15]</sup>如果霸权国带头违反国际规则,则其霸权的合法性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以霸权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将会被极大削弱。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很多时候,霸权不仅与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创建密切相关,也有利于这种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遵守与执行。“从实践看,国际机制与霸

[11]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1971, pp.398-419.

[12] Organ R.Young, Regime Dynamic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International Regime,edited by Stephen D.Krasn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01.

[13] 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1982,pp.199-200.

[14]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15] 同[6],第29-38页。

权存在着某种实质性的联系。由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国际机制的建立是困难的,往往需要霸权国利用其超强的国家实力支持国际机制的建立并适用于其他国家。”<sup>[16]</sup> 在一些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实例中,“霸权与国际机制不仅存在相互依赖,还存在相互制约:霸权以及霸权结构从根本上制约国际机制的变化及其作用的发挥,而国际机制也制约霸权的恶性膨胀”<sup>[17]</sup>。因此,虽然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能够依托事实来论证霸权后合作仍然可行,但这只是指出将霸权稳定论“绝对化”的错误之处,而不能推翻该理论在许多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与遵守问题上的解释意义。换句话说,不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任何时候,而是许多时候,霸权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与遵守是紧密相关的。

### (三) 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变迁与解体的分析

霸权稳定论认为,当霸权国家面临实力衰退,以及新兴国家崛起时,意味着国际体系出现失衡状态。当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时,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霸权战争。霸权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旧的国际体系被打破,新的国际体系逐渐构建。<sup>[18]</sup> 而在这种霸权体系的更替之间,意味着维护旧的霸权体系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遭到解体,以及维护新的霸权体系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逐渐形成。

无疑,霸权稳定论的以上命题的立足点是有关霸权的概念。什么是霸权,基欧汉对其有着精确的归纳,即“霸权稳定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应用,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把霸权的概念定义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其中,四项资源非常重要,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sup>[19]</sup> “霸权和帝国是不一样的,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sup>[20]</sup>。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霸权的实力主要来源于诸如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等有形资源,以及威望、感召力等无形资源。而霸权国力量强弱的变化就意味着其力量资源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在预示着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可能的变化。一国霸权的力量结构可以有利于某种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强势发展,同时这种力量结构的削弱或打乱也意味着相关机制的支持力量的减弱。也就是说,当霸权国实力衰落时,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强行维持某种国际经济法律机制,以反对“不情愿的参与者”,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诱导”其他国家参与及遵守此种机制。而且,由于霸权国实力下降,维持该机制所付出的代价就相对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谋求将额外的负担转嫁给其它的盟国。与此同时,原来属于二等地位国家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开始积极地支持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甚至重新制定对于自己有利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霸权稳定理论”就成了“资源是力量的理论”,该理论试图将有形的国家能力(概念化为‘实力资源’)与国家行为联系起来。这时,霸权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力量成正比,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变化又反映了国际体系力量分配的变化。<sup>[21]</sup>

虽然基欧汉等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国际机制自身可能具有一

[16] 门洪华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17] 同上。

[18] 同[6],第185-186、195页。

[19] 同[9],第37页。

[20] 同上,第52页。

[21]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296页。

定独立性和生命力,当霸权衰退后机制可能会保持惯性而得到继续发展。不过,霸权稳定论的以上论断也能解释历史上许多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更替。如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以一系列促进与鼓励自由贸易的双边协议,建立起其主导的霸权体系,但当 20 世纪初英国经济开始衰退,其他国家,如德国、美国崛起时,英国的对策是逐步缩小它在全球的部署。同时,英国修订了不少国内外经济政策,使得它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削弱。<sup>[22]</sup>至 20 世纪 30 年代,原先英国支持的霸权体系已退缩到只维持于殖民帝国和英联邦成员的帝国特惠体系。同样,美国通过 GATT 的多边谈判领导着贸易自由化,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欧洲国家与日本在贸易上的竞争力不断提高而美国经济相对衰退,美国新保护主义势力开始抬头。由于通过贸易谈判降低了正式关税,美国就树立起非关税壁垒,1973 年的《多种纤维协定》对许多国家规定了配额就属于这种情况。美国还把“自愿”出口限制强加给日本商品。为对付扶摇直上的美国贸易赤字,里根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刀阔斧地修改了美国多边主义政策。这一届政府开始采取多轨道贸易政策,不仅不再强调多边谈判,且加强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尤其是对日本实行“管理贸易”),同时通过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支持了经济区域主义的抬头。<sup>[23]</sup>

可见,虽然霸权稳定论有关霸权的衰落将导致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制度,乃至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变迁或解体的命题,并不能够解释历史上所有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变迁或解体之现象,但至少它能够部分的国际机制,甚至是历史上与当代主要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变迁或解体原因,提供一个具有一定合理性、或者说来自国际体系变化角度的答案。

### 三、“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诠释张力的不足

由于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悲观看法根深蒂固,以及立足于权力与安全的不变目标,即使是霸权稳定论,也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机制的分析方面留下重大缺陷,这相应地导致了它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诠释张力之局限。

#### (一) 有关霸权为国际合作的必要与充分条件的缺陷分析

霸权稳定论者提出了在霸权的条件下国家之间可以有限合作的观点,即他们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无疑,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没有霸权的前提下开展国际合作与缔结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可能,也否定了霸权衰退之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存续性。然而,尽管霸权可能促进合作,其是霸权体系的稳定者,也是相关国际机制的缔造者以及维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是开展合作与相关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缔造的必要条件,没有霸权的存在,国际合作仍然可能开展,国际经济法律机制仍然可能缔造以及存续——这就是基欧汉为代表的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观点之一。

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看来,虽然国际合作可能通过霸权的存在而培育起来,而且霸权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但这并不表示霸权与合作可以互相取代,相反,它们常常是相互的共生的关系。鉴于此,基欧汉认为,霸权稳定论是很粗糙的,在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中并不能得到有力支持,例如,正是在美国主导的时期,出现了已有国际经济规则的瓦

---

[22]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7-108 页。

[23] 同上。

解和持续增加的纷争趋势；而对英国霸权经验的仔细考察，也会使人们怀疑英国霸权在 19 世纪促进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即虽然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它并不能一直执行它所希望的国际经济规则。<sup>[24]</sup>因此，“这种只由一个例子，或者至多不超过两个例子支持的霸权稳定论，使人们怀疑其普遍有效性。……单单强调权力因素在创造一个合作可以盛行的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意义，还是不充分的，那种认为霸权是合作出现的必要条件，在理论和经验上也是非常薄弱的”<sup>[25]</sup>。同时，基欧汉的这种批判得到许多其他机制主义者的支持。例如，阿瑟·斯坦指出，霸权国衰落不仅不是必然带来国际合作的失败，却有可能为合作带来更大的激励，因为这时已经没有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确切地讲，斯坦认为，国际系统更接近于一种求过于供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情况，每个国家都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因此，当小国一旦意识到再也没有霸权国提供的“搭便车”的机会，它们可能转变成愿意支付的顾客。<sup>[26]</sup>显然，对于斯坦来讲，利益是可以单独地有效维持制度的因素，霸权的衰落甚至可能导致更强大的制度的产生。

客观上讲，霸权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与合作和像国际机制之类的制度相互关联。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但是与一种帝国的权力不一样，霸主在没有其他主权国家一定程度的同意的基础上，是不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不过，当霸权衰落之后，国际合作仍然是可能的，一方面是因为霸权衰弱后原有机制仍然可以维持，因为机制所能提供的诸如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让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因共同利益会使得相关的国家具有创造合作机制的积极性，即使没有霸权国家，只要这些国家认为共同利益非常重要，并且其他重要的合作条件也能满足，那么利己主义会推动各国寻求合作并创造合作机制——这就是建立在对“霸权稳定论”有关霸权是国际合作的充分与必要条件的批判基础上，基欧汉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最核心理论，即“霸权后合作论”的中心思想。<sup>[27]</sup>事实表明，基欧汉对“霸权稳定论”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霸权后合作论”，在解释国际合作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方面更具有合理性。

从实践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 70 年代初，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并于 1971 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拉开了国际金融体制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的序幕，也决定了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但这时，作为国际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机构的 IMF 并没有破产，反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获得新的生命力。与此相似，WB 也从主要为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战后重建服务转移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建设，也使得该机构重现活力。同时，美国霸权的“衰弱”也没有妨碍新的国际制度的诞生，如 1973—1974 年的中东石油危机使西方世界品尝到既无霸权也无国际机制的痛苦，这直接导致了 1974 年《国际能源规划协议》的签署和国际能源机构(IEA)的建立。<sup>[28]</sup>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整个世界迎来了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的浪潮，美国在许多领域的谈判中充当了领导角色，如在 GATT 的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仍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霸权国，因 GATT 谈判机制同样起到很大的作用。无 GATT 长

[24] 同 [9]，第 41-43 页。

[25] 同上，第 44 页。

[26] 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1982, pp.199.

[27] 同 [25]，第 59-133 页。

[28] 门洪华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36 页。



期发展起来的有效谈判机制,即使有美国的带头行动,也不一定能取得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

因此,霸权稳定论否定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及立足于霸权基点解释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缔造与解体现象并不完美,严格地讲,其更适合解释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实例。事实表明,霸权既不是国际经济法律机制产生与存续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在国际体系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变量,能影响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国家的对外行为。

## (二) 有关国际机制供给学说的缺陷分析

霸权稳定论者所持有的是一种国际机制供给论,即认为国际机制的产生在于霸权国家的提供,国际机制的存续依赖于霸权国的支持,如果霸权国衰落,意味着国际机制将走向崩溃,诸如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等再也无法运转,因为这时已经没有其他的哪个国家愿意以及能够支撑这种“公共物品”的运转成本。<sup>[29]</sup>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讲,霸权稳定论有关国际机制供给说的理论逻辑并不是很合理的,因为其无疑是将国际制度假设为既定的,并不需要思考为什么需要国际制度,以及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另外一种国际制度的问题。因此,推及到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研究上,霸权稳定论对其的理论贡献并不包括为其提供合理性基础的解释。

就如基欧汉指出,霸权稳定论理论所提出的制度供给理论认为机制是既定的,并未考虑国际机制需求的不规则变动,因此,它必然是不完整的。由此出发,霸权稳定论被基欧汉纳入到一个完全从微观经济学借鉴而来的供应—需求分析框架中,试图以此匡正霸权稳定论的某些缺陷,并集中探讨国际机制的需求问题,为得出一种有关国际机制的产生的更加全面和合理的解释提供基础。通过分析,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密度的增加将导致对国际机制的更大需求和更为广泛的机制,即“由于更大的问题密度将可能成为高度相互依赖情势的一个特征,这将渐渐推进相互依赖与国际机制之间的联系。即使在战略互动和不稳定均衡的条件之下,机制也许有行为体提供信息的功用。由于高质量的信息降低了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预期存在对提供该信息的国际机制的需求”<sup>[30]</sup>。无疑,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运作是以权力的分配和运用为条件的,如果霸权稳定论者所认为的有关霸权能够取代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运作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出:霸权的衰落可能使得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需求增加。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当政府需要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时,它就会出现,而是指在霸权之后机制作为限制不确定性和增进达成相互获益的协议来说,其潜在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国际机制产生的驱动力是“需求”而不是“供给”。<sup>[31]</sup>

正是立足于利益与理性主义基础,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与霸权稳定论针锋相对的国际机制“需求说”,即国际机制产生与运行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际社会成员的“需求拉动”而不是霸权国的供给愿望。他们认为,在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交易费用过高”等因素的国际关系领域,国际机制不仅能够如同寡头垄断下产生的格式合同一样,影响与减少着相对交易成本,也能够帮助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不负责任的行为”等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如果各自自行其事,甚至一意孤行,

[29] 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1982, p.199.

[30] 基欧汉:《对国际机制的需求》,载于(美)罗伯特·O.基欧汉著,罗伯特·O.基欧汉、门洪华编:《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31] 同上。

不仅将导致共同损失,也无法达成共同收益。由此,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国家之间需要创建国际机制。这样,机制也像市场里的商品一样,其产生不是由霸权国供给而是出于需求的,即国际体系的独特本性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需要使得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得以产生。<sup>[32]</sup>

从论证的严密性以及客观实践看,我们认为,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国际机制的“需求说”,确实比霸权稳定论的“供给说”更具有说服力。正如唯物辩证法所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即外因是辅助条件,内因起决定作用一样。如果霸权国的供给能力与愿望是国际经济法律机制产生的外在条件,那么包括霸权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需求即是它们产生的内在动力。从作用的程度看,显然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需求”动力大于霸权国的“供给”条件。因此,霸权稳定论的国际机制供给理论不能准确解释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产生与运作的根本原因,不能为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发展提供“合理性”基础的解释。

### (三) 理论简约化导致的解释不足

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一样,霸权稳定论所提供的是一个非常简约化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不仅将国家视为单一相同的行为体,而且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联系。但是,现实世界的是复杂的。虽然霸权稳定论的理论简约可以带来有利于宏观上分析把握的好处,但这种简约却可能有使分析结果偏离事实的风险。同样,对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解释方面,也会存有许多不足或偏差之处。

一方面,霸权稳定论将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而过分地忽视国内因素,从而在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产生、维持以及解体的解释方面存在着某种缺陷。传统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基本上遵循的是一种“从外至内”的研究路径,即主要考虑的是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行为体对该国的有关参与或遵守国际法方面的外来影响,对于来自当事国国内的各种因素,如国家领导人偏好、法治意识、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等,可能给该国造成的影响基本上未加考虑。因此,缺乏对国内因素的关注与分析,显然是传统国际法学的缺陷之一。而霸权稳定论未能弥补这种不足。具体地讲,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的霸权稳定论,虽然能够部分地解释二战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变化的原因,如关贸总协定的创立与遵守问题上美国的作用等,但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而不是一种非常清晰的解释模式,据此很难全面解释或清楚预测这些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变化,原因之一即是霸权稳定论对国内各种因素的考虑不足。例如,霸权稳定论可以做出霸权国家衰退必然导致有关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变革的假设,但单纯用霸权实力作为论据是不充分的。在很多情况下,尽管霸权国家衰退了,但霸权国家许多强势利益集团可能愿意维持原先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甚至推动它们继续发展。典型如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虽然因为国力相对衰退而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但 8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国内支持自由贸易的利益集团仍然推动着自由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发展,典型是推动了 GATT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进展,并 1995 年 WTO 的成立。

另一方面,以国家为中心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多种联系的存在。对此,基欧汉指出:“霸权衰落理论忽视了由各国的多渠道联系——以多国公司和其他跨国行为体、政府官僚机构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为表现形式——所引致的复杂

[32] 同 [25],第 109-132 页。

性。某些国内政治运动反对公开的、国际主义的政策,这主要是多国公司的国外投资的真实影响或人们所认为的影响所导致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确认跨国公司真正促进了美国的海外霸权。因此,跨国公司给权力的衡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且有可能导致真实权力与其表象之间出现脱节。”<sup>[33]</sup>无疑,霸权稳定论的这种局限无论是对于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还是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变迁问题,难免留下遗漏。实际上,当前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发展已经不是单一由国家推动以及国家之间谈判为唯一途径,包括了次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NGOs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等多种主体的积极参与,并形成复杂多样、纵横交错的“跨国联系”,使得国际经济立法以及遵守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显然,霸权稳定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可以看到,霸权稳定论的理论简约化导致了其对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变迁的解释不足。

#### 四、结语

晚近,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迁,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学派视野下,包括国际经济法在内的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呈现出从否定到逐渐肯定乃至大力推崇的趋势。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框架,以供给论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正是现实主义理论脉络为呼应时代需要而做出的理论突破。客观地讲,虽然霸权稳定论遭到了诸多的批判或否定,但其基本的理论思想与研究思路至少为国际社会主要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构建与运作、变迁与解体以及“合法性”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思路。

当然,霸权稳定论所支持的机制供给论思想,所提倡的国际合作以及合作的延续全凭霸权国的意志,否定国际机制本身的独立性之观点,显然无法全面解释霸权(相对)衰弱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继续维持之现象。也正是霸权稳定论这种有关国际合作方面的理论缺陷,成就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后合作论”的诞生。因此,霸权稳定论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善之处,如果其能够在以上方面得以提高,我们相信,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以及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解释力度将得到加强。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思路始终把握住了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所面临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即国际体系的基本权力结构制约着机制作用的发挥。无疑,当前主要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基本上是由霸权国主导建立或与大国协调建立的,主要反映了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利益。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易受大国或其成员政策与相互关系的影响,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在维护国际合作等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局限性。<sup>[34]</sup>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的理论解释,在很多情势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仍然是霸权稳定论把握住了问题的根源或实质。

总之,对于霸权稳定论在解释国际经济法律机制方面的张力与局限,我们必须客观对待,即虽然有局限,但仍然不失为分析国际法律机制的各种现象的一种有用途径。

(责任编辑:汪小珍)

---

[33]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34] 门洪华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第51-53页。